

# 排他性与联通性: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

刘长喜 陈心想

**内容提要:**利用2007年国际社会调查组织“闲暇娱乐时间”课题中的美国数据,本文检验了五类自愿组织的社会参与对人们普遍信任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包容性的组织和排他性的组织,不同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均表明,参加包容性社团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形成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且参加此类组织活动的频率越高,形成的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与此同时,参加排他性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形成没有明显影响。只有在包容性组织中,个体的联通性才对普遍信任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发现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意义在于,为了促进普遍信任的产生,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有益于包容性组织及其组织活动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排他性;联通性;社会参与;普遍信任;自愿组织

## 一、问题的提出

对信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他把信任看作是“社会中最重要整合力量之一”(Simmel,1950[1908]:318),并认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会瓦解”(Simmel,1990[1900]:178)。自社会学大师齐美尔开创对信任的研究以来,许多社会学家如帕森斯(1937)、卢曼(1979[1968])等也都非常强调信任的重要性(Barber,1983:156)。

信任一般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存在于特定的熟悉个体之间,而后者还存在于陌生人之间(李伟民、梁玉成,2002)。人们不仅信任他们的朋友、邻居或者公共机构,同样也可以信任那些不是他们的朋友,甚至不是十分了解的人(Robinson & Jackson,2001)。因为普遍信任是一种公共社会资本,所以我们也称之为“社会信任”,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本文,“社会信任”和“普遍信任”作为一个术语的不同表达方式交替使用。

在过去十多年中,社会信任已经被不同学科所广泛关注,特别是社会信任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作用,获得了广泛的研究。比如有些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民主的稳定性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Uslaner,2003);有些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度以及政府职能的完善(Putnam, 2000);有些研究认为社会信任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Fukuyama, 1995; Zak & Knack, 2001; Berggren, Elinder & Jordahl,

**作者简介:**刘长喜,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陈心想,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基金项目:**2016上海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2016110203)。

2008);还有些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有助于主体幸福感的提高(Helliwell, 2006)。然而,关键问题是,到底是什么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和提高?

当前关于社会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野。就宏观层面而言,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制度、道德以及经济等因素影响了社会信任的产生;就微观层面而言,许多学者从个体心理因素、遗传因素、道德水平、收入、职业、文化程度、权力和网络等方面解释社会信任的形成及差异(王绍光、刘欣, 2002;敖丹、邹宇春、高翔, 2013;胡安宁、周怡, 2013)。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信任产生机制认识的割裂。如何将宏观与微观视野有机统一起来,成为研究信任产生机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探索,如有学者从公共资源丰欠与个体资源多寡的角度分析信任产生的差异性(敖丹、邹宇春、高翔, 2013)。从社会参与角度入手也是解决当前宏观与微观研究割裂的一个突破口。比如,有学者将社会参与分为吸纳式参与和关切式参与两种类型来研究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高勇, 2014)。也有学者发现参与的社团越多,参与社团活动越频繁,普遍信任度也越高(胡荣、李静雅, 2006)。

人们在参与自愿组织时,将会产生两种类型的信任:一是基于组织成员内部之间的特殊信任(Yamagishi T. & Yamagishi M., 1994; Light, 2015);二是对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Stolle & Rochon, 1998)。进而言之,在社会参与中,个体参与组织的类型以及个体和组织的联通性对社会信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Kaufman, 2002; Browning, Feinberg & Dietz, 2004; Beyerlein & Hipp, 2005; Paxton, 2007)。有学者从组织目标和组织成员的多元化程度的角度研究了社会信任的产生问题。基于组织目标的不同,将组织划分为七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组织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比如“文化类、个人兴趣类和社区类的组织,其成员的普遍信任度较高”(Stolle & Rochon, 1998: 57)。同时,研究发现组织成员多元化程度最低的组织不太可能产生高度的社会信任(Wollebak & Selle, 2002)。帕克斯顿率先检验了组织与外界联通性的差异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她发现,和孤立的组织相比,与其他自愿组织相关联的自愿组织对普遍信任的产生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而孤立的社会组织对社会信任的产生没有任何作用(Paxton, 2007)。但是,如果用政治的和非政治的组织目标来划分社会组织,有些学者(比如 Wollebak & Selle, 2002)在有关政治组织和社会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得到了不同结论。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关于社会组织类型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虽然自愿组织的联通性对社会信任的积极影响看上去已经得到了理论认同和经验支持,但是当组织与其他不同类型的组织相联系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需要被检验。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从社会参与的角度将两个维度——组织目标和个体联通性——结合起来对社会信任的产生进行分析。我们基于组织目标,把组织区分为包容性组织和排他性组织,并检验两类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同时也检验个体的联通性——参与多种类型的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影响。

##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组织的排他性与普遍信任

现有文献在区分不同类型的组织对信任的影响上存在四种观点。其一,一些研究强调组织的包容性及成员的多元化有助于普遍信任的产生。包容性及多样性主要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职业声望)、宗教信仰等几个方面来测量。普特南研究发现,组织包容性强以及成员多元化程度高的组织会产生较高

的普遍信任(敖丹、邹宇春、高翔, 2013; Light, 2015)。其二,一些观点聚焦于组织结构——组织内部横向的或者纵向的关系——与普遍信任的关系。这一观点认为,拥有更多横向联系的组织能够产生更高的普遍信任(Putnam, 2000)。其三,一些研究侧重研究组织的政治化程度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为了挑战普特南的层级假设,有研究发现,组织的政治化程度越高,它们对普遍信任产生的影响就越大(Wollebak & Selle, 2002)。其四,一些研究侧重从组织与外部联系与否的视角研究普遍信任的产生。帕克斯顿发现与其他组织存在联系的组织比与其他组织缺乏联系的组织,在普遍信任产生过程中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控制了国家层面的变量之后,孤立的组织甚至对普遍信任的产生有消极影响(Paxton, 2007)。

基于这些简短的回顾,我们将着重论述两个方面:组织目标的信仰体系以及组织的联通性。前者与组织的包容性或者说其成员的多样性有关;后者与组织是与其他组织相联系还是孤立的状态有关。

各种组织使其参与者接触到那些建立在其组织目标基础上的不同信仰体系<sup>①</sup>(比如,基督教教堂和足球俱乐部的情况就是不同的)。组织也因此具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并提供不同的情境来协调成员之间的互动。同时,在影响价值观(比如宽容)产生上,重要的并不是互动本身,而是那些表达组织中互动情境的文化和规则(Hooghe, 2003)。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现实是社会建构的。参与者亲历他们的组织化生活,并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组织的信仰体系。有一些机构,比如基督教教堂,具有非常强的排他性信仰体系,但是其他一些机构却没有。而拥有中立文化的组织往往更加包容和开放。具有排他性信仰体系的组织的成员更有可能拥有与其他组织的信仰相冲突的信仰(极端的例子比如,一些类似中国的青帮和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的秘密组织<sup>②</sup>)。简而言之,一个组织中存在的排他性越强,它和其他组织发生冲突的几率越大,并导致其成员更不容易信任与他们信仰体系不同的人<sup>③</sup>。

在社会学领域,当前关于组织的排他性对其成员的信仰体系和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在政治学相关研究中,有个理论假设认为,先存的信仰会对新信息的过滤产生强烈影响。这一假设与阐述认知不协调和偏见同化观点的文献一致(Leach & Sabatier, 2005; Henry, Lubell & McCoy, 2010)。对新信息的滤除将会导致信任过程中的阐释和预期发生变化,“在核心信仰上有差异的个体会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也经常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一种给定情况”(Leach & Sabatier, 2005: 494)。这一现象也被Zucker描述为“背景预期”,意思就是“当个体感觉到他们在与他人享有相同的信号、规则和对世界的阐释时,他们就更可

① 齐美尔在《冲突:群体关系网络》(1964)一书中已经指出,通过产生特殊形式的信任,组织也许已经产生了排他性。这种排他性最终会减少一般性信任。

② 郑也夫在其著作《信任论》(2001)里提供了一个关于帮会中信任的详细研究。青帮的历史展示了社会为什么缺乏对陌生人信任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建立和加强成员间的信任,青帮用了四种方案:互惠/互助,比一般的系统更高效,对背叛行为处以极刑,以及固定的仪式、传统和规章。

③ 在体育组织的排他性研究中,有两种观点。尤斯兰纳(1999)认为,因为体育培育了自信、社会关系和道德,所以它是一个创建社会资本的舞台。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很清晰地阐释社会信任是如何产生的。基于其关于自愿组织的多种特点是如何影响“民主进程”的独特理论分析,沃伦(2001)认为,体育组织深刻地影响了“公民美德”,例如互惠、信任和认可。沃伦的解释是基于他对自愿组织特点的分析,包括成员的组成方式(尤其是,是否存在一个便于实现的出口选择)和社会的(非政治的)与既定的(内部被规范的)角色。可是,当在自愿组织社会资本的产生过程中描述一种社会机制时,塞佩尔(2006: 注释9)谈到了体育本质上的竞争性。不同于英国古典的体育理想——无论结果怎么样,一个竞争者应该被尊重……并且这也许就是关于体育的古典道德思想的核心(Seipel, 2006: 注释9),现代的体育由于它的竞争性,从而影响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和互动:胜利者获得战利品,变得不那么有利于社会资本的产生(Yesalis et al. 2001: 43)。然而,通过挪威人的案例,塞佩尔(2006)发现,作为一个自治体育组织的成员有利于普遍信任的产生。不同于斯特勒和罗尚(1998),我们没有将体育组织作为个人兴趣组织,并认为它应该独立在外。

能将这个世界和他人看作是可预测的,因而更容易去信任”(Paxton, 2007: 49)。因此,冲突会使那些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产生不信任。

沿着托克维尔的传统,普特南认为,参与自愿组织产生了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了民主(Putnam, 2000)。也有学者质疑自愿组织在产生普遍信任中的角色,认为其在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Delhey & Newton, 2003)。在上面文献回顾基础上,我们需要通过信仰体系中的排他性对组织进行区分,以此来评估“与各种类型的组织相关联的社会资本,哪些类型实际上对社会和政治的后果有意义”(Seippel, 2006: 172)。

为了检测组织成员身份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有的学者将群体组织依据其目标分为七种类型,这些组织目标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群体权利的、文化的、社区的、私人兴趣以及社会闲暇的。他们发现,“政治性的组织拥有最具政治特色的成员,但是却更不可能有普遍信任、政治信任”(Stolle & Rochon, 1998: 6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给定了源于组织目标的信仰体系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参加社团组织对社会信任产生的影响会来自信仰体系不同的排他性,排他程度范围是一个从强烈的包容性到强烈的排他性的连续谱。

由于掌握的数据有限,本文将检验五种类型的组织:体育组织、宗教组织、政治组织、市民组织和文化组织。直观地看,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在给其成员提供信仰体系时的排他性最强,而市民组织和文化组织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宗教组织的排他性来看,比如,有学者发现孟加拉国农村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比起其他人更愿意相信和他们拥有同一信仰的人(Johansson-Stenman, Mahmud & Martinsson, 2009)。再来看体育组织,由于体育具有明显的竞争特性(Seippel, 2006),因此被划分为排他性组织。这种以建立在组织目标之上的信仰体系为区分依据的分类方法与帕克斯顿依据联通性来区分组织的方法具有一致性。根据帕克斯顿的研究,各类组织的成员与其他组织的成员有联系的比例(标准分数)分别为:宗教组织(-1.39)、体育或者娱乐组织(-1.09)、政治组织(-0.1)、文化组织(0)和市民组织(0.5)(Paxton, 2002)。我们的研究方法在经验层面上与孤立的组织和联系的组织的定义相一致,但是与帕克斯顿的理论并不一样。我们将那些有排他性信仰体系的组织定义为排他性组织,把那些没有排他性信仰体系的组织定义为包容性组织。我们的方法确实与帕克斯顿的方法有所不同。她是把“联通性”(connectedness)定义为,一个组织,如果成员身份是多元的,这个组织就是联通性组织。我们是把“联通性”定义为,一个人如果同一个时间段参加了两个及以上组织,即该人具有联通性。这个层次的转换,可以比帕克斯顿的方法更好地检验出在组织性质给定的情况下(包容或者排他),个人参加组织的不同情况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测量组织的性质特点对个人的信任水平的影响。基于前文的描述,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 参加排他性组织对普遍信任的产生没有积极作用,而参加包容性组织对普遍信任的产生有积极作用,并且参加次数越多,产生的普遍信任程度也越高。

## (二)个体的联通性与普遍信任

为了解释信任是如何在组织之间扩散的,帕克斯顿提出了组织联通性理论,认为和孤立组织中的成员相比,与其他自愿组织相关联的自愿组织的成员更容易信任其他人。联通性的组织指的是“通过其多元化的成员与其他自愿组织相联系的自愿组织”(Paxton, 2007: 51)。

这种在联通的组织 and 孤立的组织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与其他理论比如跨部门组织和非跨部门组织以及跨越型组织和紧密型组织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区别在于“这一理论更多地关注组织之间的联系而非组

组织内部的多样性”(Paxton, 2007: 51)。组织成员的社会网络超出某个单一组织是联通性组织的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特征对普遍信任的生成有积极作用。个体成员的多样性带来了组织之间的网络(Moody & White, 2003)。通过这些网络,信任被转递给了特定组织之外的个人(Glanville, Anderson & Paxton, 2013)。帕克斯顿分析了普遍信任产生的过程,并从理论上总结认为,与孤立的组织相比,信任更容易在关联性的组织中滋生蔓延(Paxton, 2007; Hommerich, 2015)。当规范、态度和行为通过社会网络传播时,社会各部分之间互动的可预测性就增加了(Marsden & Friedkin, 1993),最终普遍信任随之产生(Zucker, 1986)。

虽然一些经验研究显示,个体之间的接触会增加信任(Light, 2015),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直接检验个体参与的组织本身的联通性在社会信任产生过程中的影响。利用联通的/孤立的分类方法,帕克斯顿发现具有联通性的社会组织比孤立的组织更能促进民主和社会信任的产生。帕克斯顿的发现表明,在个体层面,伴随着成员之间联系的发生,无论是联通性组织中的个体还是孤立组织中的个体都能够产生普遍信任。但是在国家层面,即便整个组织的联通性仍然对普遍信任的产生有着积极的影响,孤立的成员也会降低社会信任(Paxton, 2007)。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先前的研究通过分析个体成员多样性检验了组织的特性,比如说关联性和孤立性。本研究则试图通过检验参与组织的个体的特征,来考察多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和个体的联通性在普遍信任中的作用。我们知道信仰冲突是造成不信任的一个原因,当组织具有排他性信仰体系的时候,个体的联通性催生普遍信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换句话说,个体的联通性,也就是个体参与不同类型的自愿组织,能否促进普遍信任的产生取决于建立在组织目标基础之上的组织信仰体系。因此,我们并不将联通性简单地看成组织之间成员多元化的产物(Paxton, 2007),而是将个体的联通性定义为个体在多类组织中的参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

假设2: 在排他性类型的组织中,个体的联通性对普遍信任的产生没有积极作用;在包容性类型的组织中,个体的联通性对普遍信任的产生有积极影响。

### 三、数据、变量和分析方法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

本研究的测量数据来自2007年国际社会调查组织有关“闲暇娱乐时间”进行的问卷调查(ISSP Research Group(2009):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Leisure Time and Sports - ISSP 2007. GESIS Data Archive, Cologne. ZA4850 Data file Version 2.0.0, doi:10.4232/1.100 79)。该组织于2007年在世界上34个国家分别抽取1 000到2 900个不等的代表性样本,对他们的休闲娱乐和社会团体组织活动的参与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仅利用了美国的数据(美国的数据是作为2008 General Social Survey问卷的一部分调查的),这些数据信息包括个人的信任、社会参与(参与自愿组织)以及其他变量数据,总样本数是1 536份,其中有效样本为1 522份。

因变量为普遍信任。为了测量个体对他人的信任程度,问卷询问了受访者这样一个问题:“总体而言,你会认为人们是可信的,或者说在与别人打交道时你不需要过于谨慎吗?”受访者的回答用一个四分量表来测量,分别对应的是“1=在与他人相处时几乎总是不能太相信”,“2=在与他人相处时通常不能太相信他们”,“3=人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信任的”,“4=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用这一

测量来代表个体的普遍信任。样本中对上述四个选项选择的比例分别为:12.2%、39%、41.9%和6.9%。

自变量为社会参与,具体分析参与组织活动的频率以及个体的联通性<sup>①</sup>。本文将组织划分为五种类型:体育组织、文化组织、宗教组织(教堂或者其他宗教机构)、市民组织(社区服务或者市民社会组织)以及政治组织(政治党派或者机构)。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与已有的研究形成对比,我们并不把教堂分在文化组织之中,而是将其划分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宗教组织(Stolle & Rochon, 1998)。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使用了参加各个组织的频次数据。用来获取这一数据的问题是:“在过去的12个月中,你大概多久参加一次以下其中一个组织或者团体的活动?”对每个不同类型组织的回答都用一张五分量表来记录,分别对应的是“1=从不”,“2=一两次”,“3=有几次”,“4=至少一个月一次”,“5=至少一个礼拜一次”。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制作了两份记录个体调查者社会关联性情况的指标。第一个记录的是排他性组织(就是指那些拥有排他性信仰体系的组织)中的个体联通性状况。任何个人只要参加体育组织、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中的至少两个,就被编码为1,其他情况则编码为0。第二个指标记录的是包容性组织(就是指那些没有排他性信仰体系的组织)中的个体联通性状况。类似的,任何个人只要同时参加市民组织和文化组织就会被编码为1,其他情况的编码为0。为了检验包容性组织和排他性组织各自的联通性对社会信任产生的影响,我们通过将排他性组织的联通性和包容性组织中的联通性相乘,从而创造了一个交互项。

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一些控制变量:教育(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为单位计算)、家庭收入(收入高低分类)、职业声望(通过将家庭中赚钱的人的职业,依据国际职业地位社会经济标准化量表转化成可用数字计量的价值)(Ganzeboom & Treiman, 1996)、年龄(以年为单位)、性别(女性=1,男性=0)、种族(黑人=1,其他种族=0)、婚姻状况(离婚=1,其他情况=0)。同时我们也加入了一个地区变量(南方=1,其他地区=0),并且测量了是城市/非城市居民(城市居民=1,其他=0)。宗教背景也同样被控制了(新教徒=1,其他=0)。政治意识形态的测量通过应答者的政治观点来体现(答案从“1=强烈的民主党拥护者”到“7=强烈的共和党拥护者”)。另外,拥有全职工作的应答者被编码为1,其他情况编码为0。家里有小孩的应答者编码为1,其他人编码为0。

根据帕克斯顿的理论观点,我们还加入了两个变量来测量个体层面的外向性,这对组织活动的参与情况以及信任都会产生影响(Paxton, 2007)。第一个变量是有关一个人与朋友相处时的愉悦程度(从“1=毫无愉悦感”到“6=感到非常愉快”);第二个变量测量一个人更喜欢如何度过自己的空闲时间(从“1=绝大多数时间都和别人在一起”到“4=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

## (二)分析策略与逆向因果关系

人们不能够确定测量信任的不同范畴点之间差距有多大。因此,我们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来检验自变量、控制变量以及信任的测量之间的净关系(Borooah, 2001; Long & Freese, 2001)。因为因变量明显违背了连续性假设最小二乘法的要求(即变量必须是连续的,或者接近连续性的),所以我们同时也运用了Binary Logit模型进行检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把四个维度合并成两个:即代表信任的类别范畴3和4合并,编码为1(数量是779,占比51.2%)和代表不信任的1和2合并,编码为0(人数为743,占比48.8%)。

这里还存在一个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到底是人们在不同组织中的社会参与对信任的

<sup>①</sup> 关于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详见附录A。

形成产生了影响,还是信任影响了人们在不同的组织中的社会参与。现在大量有说服力的理论认为,信任对人们在组织中的参与情况存在反向因果效应。换言之,一个信任感更强的人会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感到更舒服,因此更喜欢加入某一个组织。但是,大多数学者(包括普特南)从理论上假设“主要的因果关系是从加入组织到信任产生”的关系(Paxton, 2007: 54)。在回顾了讨论自愿组织和信任的相关关系的文献之后(Brehm & Rahn, 1997; Shah, 1998; Claibourn & Martin, 2000; Glanville, 2001),帕克斯顿认为:“虽然有更具说服力的观点支持反向的影响,但是证据的中心还是更偏向组织对信任有单向而不是交互影响。”(Paxton, 2007: 54)另一方面,信任确实使组织成员人数有所增加,组织的成员数量不能被当作外生的没有偏置的结果(Sønderskov, 2011)。在我们的研究中,虽然回归模型都没有建立起因果的方向,但是因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在实质上是更明显合理的系数,这不太可能纯粹反映出一个逆向因果关系。

#### 四、研究发现

##### (一)社会参与组织类型与普遍信任

下页表1报告了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预测的不同类型自愿组织的社会参与(参与自愿组织活动的频繁程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结果。在这里,我们用了Wald test对平行回归假设进行了检验。为了避免仅仅是偶然原因得到的能表示重要假定值的个别参数,我们分别用了Stata和GOLOGIT2两种Brant检验,后者是用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验证社会信任的系数(Williams, 2006)。GOLOGIT2对于违反平行比标准的Brant检验更敏感,当在GOLOGIT2中将系数设置为0.01时,结果是相似的。由于这些结果是趋同的,并且主要的预测都没有违反平行系数假设,所以这里我们只报告净Ordered Logistic回归的系数。模型一、二、三说明参与排他性组织不会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参与体育组织和宗教组织的系数是负的,但是在常规显著性水平上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虽然参加政治组织的活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明显。模型四和模型五证明了参与包容性组织对社会信任的产生有积极影响,并在统计数据上有0.001的显著性水平。在所有的自愿组织中,文化组织对社会信任的产生有最明显的影响。表1中的模型六包括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并测量了参加所有五种类型的组织的情况。即便在控制了类似体育组织、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排他性组织的影响之后,无论是对市民组织还是文化组织而言,预估的参加包容性组织和产生信任的相关系数仍然是正的,并且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市民组织是0.05的显著性水平,文化组织是0.001的显著性水平)。有趣的是,在控制了包容性组织变量之后,参加政治组织的系数变为了负数,但是在通常水平上仍然没有呈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与此同时,同时参加体育组织和宗教组织的统计系数在最后一个模型中明显变大了,并且前者的显著性水平是0.05。

进一步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由于篇幅所限,没有报告该模型具体数据),参加排他性组织对信任的预期影响是正的,但是没有一个数据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并且这种预期的不确定性非常高。另外,在对参加包容性组织的情况进行控制之后,它们都变为了负数,但在统计上还是不显著。与之对照,在最后一个模型中,参与包容性组织仍然对社会信任的产生有积极作用。在文化组织的例子中,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仍然很高。

总而言之,从Ordered Logistic回归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与假设1是一致的,即参加排他性组织对社会信任的产生没有积极作用,但是参加包容性组织却有积极作用,且随着参与活动频率的

表 1 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影响的 Ordered Logistic 模型结果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社会参与						
体育组织	-0.038 (0.043)					-0.101* (0.045)
宗教组织		-0.0004 (0.036)				-0.043 (0.037)
政治组织			0.081 (0.090)			-0.050 (0.096)
市民组织				0.152*** (0.046)		0.120* (0.052)
文化组织					0.233*** (0.053)	0.242*** (0.058)
控制变量						
年龄	0.017*** (0.004)	0.017*** (0.004)	0.016*** (0.004)	0.017*** (0.004)	0.016*** (0.004)	0.017*** (0.004)
女性	-0.214 <sub>t</sub> (0.110)	-0.208 <sub>t</sub> (0.110)	-0.198 <sub>t</sub> (0.109)	-0.221* (0.109)	-0.190 <sub>t</sub> (0.110)	-0.227* (0.112)
城市居民	0.094 (0.137)	0.104 (0.137)	0.098 (0.137)	0.067 (0.137)	-0.124 (0.138)	0.103 (0.138)
美国南部	-0.405*** (0.113)	-0.413*** (0.114)	-0.406*** (0.113)	-0.423*** (0.113)	-0.410*** (0.113)	-0.416*** (0.114)
离婚	-0.192 (0.139)	-0.209 (0.140)	-0.200 (0.139)	-0.203 (0.140)	-0.211 (0.140)	-0.238 <sub>t</sub> (0.141)
教育(年数)	0.117*** (0.022)	0.117*** (0.022)	0.114*** (0.022)	0.108*** (0.022)	0.103*** (0.022)	0.100*** (0.023)
家庭收入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政治观点	0.030 (0.027)	0.028 (0.027)	0.032 (0.027)	0.026 (0.027)	0.030 (0.027)	0.029 (0.027)
新教信仰	-0.084 (0.149)	-0.075 (0.151)	-0.082 (0.149)	-0.078 (0.149)	-0.064 (0.150)	-0.047 (0.153)
黑人	-0.355* (0.177)	-0.359* (0.179)	-0.376* (0.177)	-0.391* (0.178)	-0.429* (0.179)	-0.399* (0.181)
工作	0.079 (0.120)	0.067 (0.120)	0.076 (0.119)	0.071 (0.120)	0.040 (0.120)	0.037 (0.120)
职业声望	0.014*** (0.003)	0.014*** (0.003)	0.014*** (0.003)	0.013*** (0.003)	0.013*** (0.003)	0.013*** (0.004)
家里有小孩	-0.149 (0.123)	-0.157 (0.122)	-0.157 (0.122)	-0.140 (0.122)	-0.143 (0.123)	-0.086 (0.124)
与朋友一起愉快	0.210*** (0.059)	0.203*** (0.059)	0.205*** (0.058)	0.196*** (0.059)	0.186** (0.059)	0.193*** (0.059)
孤独	-0.018 (0.055)	-0.017 (0.055)	-0.012 (0.055)	-0.005 (0.055)	-0.007 (0.055)	-0.0007 (0.056)
Pseudo R <sup>2</sup>	0.081	0.081	0.081	0.084	0.087	0.091
Likelihood Chi <sup>2</sup>	255.05	257.47	256.19	264.75	273.18	285.13
Probability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1353	1354	1355	1354	1351	1348

注:†p≤0.10, \*p≤0.05, \*\*p≤0.01, \*\*\*p≤0.001(双尾检验)。括号里是标准误。

提高,社会信任程度也更高。

## (二)社会参与、个体联通性与普遍信任

下页表 2 展示的是 Ordered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个体联通性的社会参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的预测结

果。在第一个模型中,包容性组织内的个体联通性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显著性水平为0.001),这也是这一模型中影响最大的变量。模型二显示参与排他性组织个体联通性的预测系数是正的,在通常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另外,其影响非常小,不确定性也非常高。模型三显示在控制了排他性组织的个体联通性之后,包容性组织的个体联通性仍然对个人的社会信任有积极作用且显著(显著性水平为0.001),同时影响系数较大。相反,在控制了包容性组织的个体联通性之后,排他性组织的个体联通性的预期系数变为负数且在统计上仍然不显著。

表2 社会参与和个体联通性对普遍信任影响的Ordered Logistic模型结果(I)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社会参与						
包容性组织	0.434*** (0.123)		0.491*** (0.133)	0.580*** (0.175)		
排他性组织		0.049 (0.119)	-0.143 (0.129)	-0.063 (0.165)		
包容性 X 排他性组织				-0.203 (0.259)		
联通性 (A)					0.339** (0.112)	
联通性 (B)						0.113** (0.039)
Pseudo R <sup>2</sup>	0.084	0.081	0.085	0.085	0.084	0.084
Likelihood Chi <sup>2</sup>	266.30	255.00	267.08	267.69	263.63	263.00
Probability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1352	1354	1351	1351	1348	1348

注: \*p≤0.05, \*\*p≤0.01, \*\*\*p≤0.001 (双尾检验)。括号里是标准误。本表的控制变量与表1一样,由于篇幅所限,将其分析结果省略。

为了检验包容性组织和排他性组织之间的联通性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我们制作了一个交互项。表2中的模型四展示了其结果,即包容性组织和排他性组织之间的联通性不能产生社会信任。由于篇幅的限制,一项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没有在这里报告,但是它们同样预测到包容性组织中的个体联通性的预期影响是积极的,而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排他性组织中的个体联通性不能增加社会信任。总而言之,分析结果强有力地支持我们的第二个假设,即只有包容性组织中的个体联通性才对社会信任的产生有积极作用。

大多数学者认为组织参与有利于社会信任的产生;一般意义上的联通性同样也会产生社会信任(Paxton, 2007)。为了检验参与组织的普遍影响和参与不同组织的联通性差异,我们将五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联通性结合在一起制作了两个变量,这里的联通性包括联通性(A)和(B)。联通性(A)是一个二元变量,如果个体参加至少两种类型的组织就编码为1(其他情况编码为0)。表2中的模型五显示一般意义上的联通性对社会信任的产生有积极影响并且统计上显著。模型六包括了联通性(B),一个测量个体参与组织的数量的连续性变量(其范围从“0=从未参加任何组织”到“5=参加了所有五种类型的组织”)。模型六显示参加自愿组织增加了社会信任,同时个体的联通性越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从这些结果来看,如果不对组织类型进行区分,将所有数据都混合在一起将会支持组织参与能够增加社会信任的观点。但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看到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组织对社会信任的产生真正起了作用,因此也会误导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

### (三)一个关于联通性的替代分析策略

替代分析策略就是利用两个独立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创造一个同时包括信仰体系和成员关系多样性的变量。我们利用这个策略所做的分析显示(参见表3),组织成员的联通性对社会信任的产生有积极作用。在五种类别的社会组织中,只有宗教组织和文化组织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同时系数达到了0.23和0.24的高水平。交互项又一次全部变为负数,只有宗教和文化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在统计上还是显著的。拿宗教和文化组织的净影响来说——只有文化组织对社会信任同时拥有实质上和统计上显著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因为排他性组织之间存在信仰价值体系的冲突,与其他类型的组织的联系会降低个人的社会信任。根据所给的联通性的净影响,可以推论,由于排他性的信仰体系,参加宗教组织会降低普遍信任。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关于不同类型的自愿组织和成员的联通性对普遍信任的影响的假设。

表3 社会参与和个体联通性对普遍信任影响的Ordered Logistic模型结果(II)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体育组织	-0.12 (0.11)				
宗教组织		0.04 (0.07)			
政治组织			-0.04 (0.35)		
市民组织				0.18 (0.11)	
文化组织					0.49** (0.16)
联通性	0.14 (0.09)	0.23* (0.09)	0.14 (0.13)	0.18 (0.09)	0.24* (0.10)
联通性×体育组织	-0.01 (0.03)				
联通性×宗教组织		-0.06* (0.03)			
联通性×政治组织			-0.02 (0.09)		
联通性×市民组织				-0.04 (0.04)	
联通性×文化组织					-0.10* (0.05)

注:\* $p < 0.05$ , \*\* $p < 0.01$  (双尾检验)。括号里是标准误。联通性:连续变量,五种类别自愿组织参加的总类型数,范围从0(一个也没参加)到5(参加所有五类组织)。控制变量与表1一样,不是这里所关注的,所以没有报告。样本量1 337份。

## 五、结论与讨论

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本文发现在研究参与社会组织和普遍信任的产生之间的关系时,必须对自愿组织的类型进行区分。参加排他性组织并不会产生普遍信任;参加包容性组织会在实质上增加普遍信任。只有在包容性类型的组织中,个体的联通性才会对普遍信任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包容性组织中的成员的联通性比排他性组织中的成员的联通性更有助于普遍信任的产生。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塞佩尔关于体育组织的研究发现相一致(Seippel, 2006)。我们发现,不仅仅参加体育组

织对普遍信任的形成没有积极作用,体育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联通性对社会信任也没有积极作用。

在普遍信任方面,我们的研究挑战了普特南关于“参与自愿组织和社会资本的形成”之间关系的观点和方法论(Putnam, 2000)。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排他性组织中拥有更多的成员关系可能会降低普遍信任。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挑战了社会学长期秉承的一种观点,即一个人在一个社会圈子里习得的社会信任往往会扩散到他在这个社会圈子之外的社会关系中(Putnam, 2000)。在回应斯特勒和罗尚(Stolle & Rochon, 1998)以及塞佩尔(Seippel, 2006)的观点时,我们的看法是在研究社会资本的产生,尤其是普遍信任的产生时,我们必须区分自愿组织的类型。对社会组织依据建立在组织目标基础上的信仰体系进行类型上的区分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理论视角,这一点在这项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

鉴于普遍信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一个社会应该拥有更多的包容性组织并鼓励个人加入它们(Storm, 2015)。我们的研究发现表明,虽然参加排他性组织的活动对普遍信任的形成没有促进作用,但是参加排他性组织在总体上仍然对社会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比如说宗教方面的参与会促进志愿活动从而对市民组织有利(Becker & Dhingra, 2001)。

当然,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这些正是未来研究努力的方向。首先,由于研究数据仅仅提供了五种类型的组织的参与频率的情况。因此,我们的研究发现可能不能推及其他类型的组织。第二,在没有成员关系的具体信息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假定绝大多数的组织活动的参与都是基于成员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推论自愿组织成员关系和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第三,这些数据缺少组织机构的地理位置的信息和纵向时间变化比较,而组织的地理位置和类型会影响组织中的社会网络结构(比如说隔多远距离的组织机构将会提高网络的多元性)进而影响社会资本的产生(Glanville, 2004)。因为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代际之间的差别也是重要的普遍信任产生的条件(Hu, 2015)。最后,有关宗教组织中社会参与的数据强调的是参与程度而不是信仰。一些研究者认为信仰是一个比归属(或者说参与)更好的测量指标(McCleary & Barro, 2006; Halman & Draulans, 2006; Berggren & Bjornskov, 2009),“与归属(或者说参与)相关的信仰是宗教和经济以及其他产物之间最大的鸿沟”(McCleary & Barro, 2006: 51)。

尽管有这些局限,我们的研究仍然在理论和实证上对参与自愿组织和社会资本的产生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扩展。它通过展示以组织目标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对组织成员和普遍信任的关系的影响,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在区分了包容性组织和排他性组织之后,我们检测了它们对社会信任的净影响,并发现只有参与包容性组织才会增加普遍信任。考虑到在组织提供的包容的或者排他的环境中参加自愿组织对市民参与(即政治参与)的影响(Walker, 2008),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分析方法也应该可以用来检验参与不同类型的自愿组织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这对于政策制定与实践的意义在于:为了促进社会中普遍信任的产生,我们需要提供有益于包容性组织和其组织活动的社会环境。目前,我们还未见到有关中国自愿组织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敖丹、邹宇春、高翔, 2013,《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的视角》,《社会》第6期。  
高勇, 2014,《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胡安宁、周怡, 2013,《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 胡荣、李静雅,2006,《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第6期。
- 李伟民、梁玉成,2002,《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绍光、刘欣,2002,《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第3期。
- 郑也夫,2001,《信任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Barber, Bernard. 198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Penny Edgell and Pawan H. Dhingra. 2001. "Religious Involvement and Volunteering: 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Sociology of Religion*, vol.62(2): 315-335.
- Berggren, Niclas, Mikael Elinder and Henrik Jordahl. 2008. "Trust and Growth: A Shaky Relationship." *Empirical Economics*, vol.35: 251-274.
- Berggren, Niclas and Christian Bjørnskov. 2009. "Does Religiosity Promote or Discourage Social Trust?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and Cross-State Comparisons." Retrieved June 2010 ([http://pubchoicesoc.org/papers\\_2010/Berggren\\_Bjoernskov.pdf](http://pubchoicesoc.org/papers_2010/Berggren_Bjoernskov.pdf)).
- Beyerlein, Kraig, and John Hipp. 2005. "Social Capital,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merican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Community Crime." *Social Forces*, vol.84(2): 995-1013.
- Brehm, John and Wendy Rahn. 1997.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1(3): 999-1023.
- Browning, Christopher R., Seth L. Feinberg and Robert Dietz. 2004. "The Paradox of Social Organization: Network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Violent Crime in Urban Neighborhoods." *Social Forces*, vol.83(2): 503-534.
- Claibourn, Michele P. and Paul S. Martin. 2000. "Trusting and Joining?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ciprocal Nature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Behavior*, vol.22(4): 267-291.
- Delhey, Jan and Kenneth Newton. 2003. "Who Trusts? The Origins of Social Trust in Seven Societies." *European Societies*, vol.5 (2): 93-138.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Ganzeboom, Harry B. G.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6.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25: 201-239.
- Glanville, Jennifer. 2001. "Ties and Trust: Understanding How Social Capital Operates in Neighborhood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 . 2004.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Why Organizational Location and Type Are Important." *Sociological Forum*, vol.19(3): 465-491.
- Glanville, Jennifer L., Matthew A. Anderson and Pamela Paxton. 2013. "Do Social Connections Create Trust? An Examination Using New Longitudinal Data." *Social Forces*, vol.92: 545-562.
- Halman, Loek C. J. M and Veerle J. R. Draulans. 2006. "How Secular Is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7: 263-288.
- Helliwell, John F. 2006. "Well-Being,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Policy: What's New?"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6: C34-C45.
- Henry, Adam Douglas, Mark Lubell and Michael McCoy. 2010. "Belief Systems and Social Capital as Drivers of Policy Network Structure: The Case of California Regional Planni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doi:10.1093/jopart/muq042.
- Hommerich, Carola. 2015. "Feeling Disconnected: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Japan." *Voluntas*, vol.26: 45-68.
- Hooghe, Marc. 2003. "Value Congruence and Convergence with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Ethnocentrism in Belgian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vol.25(2): 151-175.
- Hu, Anning. 2015. "A Loosening Tray of Sand? Age,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on Generalized Trust in Reform-Era China, 1990-2007."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51: 233-246.
- Johansson-Stenman, Olof, Minhaj Mahmud and Peter Martinsson. 2009. "Trust and Relig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Economica*, vol.76: 462-485.
- Kaufman, Jason. 2002. *For the Common Good? American Civic Life and the Golden Age of Frater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ach, William D. and Paul A. Sabatier. 2005. "To Trust an Adversary: Integra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odels of Collaborative Policymak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9(4): 491-503.

Light, Ryan. 2015. "Like Strangers We Trust: Identity and Generic Affiliation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51: 132-144.

Luhmann, Niklas. 1979[1968]. *Trust and Power: Two Essays*. Chichester: John Wiley.

Marsden, Peter V. and Noah E. Friedkin. 1993. "Network Studies of Social Influence."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22(1): 127-151.

McCleary, Rachel M. and Robert J. Barro. 2006. "Religion and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0: 49-72.

Moody, James and Douglas R. White. 2003. "Structural Cohesion and Embeddedness: A Hierarchical Concept of Social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8(1): 103-27.

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Paxton, Pamela.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7(2): 254-277.

———. 2007.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nd Generalized Trust: A Multilevel Model Across 31 Countries." *Social Forces*, vol.86(1): 47-76.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Robinson, Robert V. and Elton F. Jackson. 2001. "Is Trust in Others Declining in America?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30(1): 117-145.

Seippel, Ørnulf. 2006. "Sports and Social Capital." *Acta Sociologica*, vol.49(2): 169-183.

Shah, Dhavan V. 1998. "Civic Engagement,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Television Use: An Individual-Level Assessment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9(3): 469-496.

Simmel, Georg. 1950[1908].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l., ed. And intr. By Kurt H. Wolff. New York: Free Press.

———. 1964. *Conflict: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Reinhard Bendix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90[1900].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Stolle, Dietlind. 1998. "Bowling Together, Bowling Alon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9(3): 497-524.

Stolle, Dietlind and Thomas R. Rochon. 1998. "Are All Associations Alike? Member Diversity, Associational Type,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42(1): 47-65.

Storm, Ingrid. 2015. "Civic Engagement in Britain: 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Inclusive Valu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1(1): 14-29.

Sønderskov, Kim Mannemar. 2011. "Does Generalized Social Trust Lead to Associational Membership? Unravelling a Bowl of Well-Tossed Spaghetti."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7(4): 419-434.

Uslaner, Eric. 1999. "Democracy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mocracy and Trust* Mark E. Warr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1-150.

———. 2003. "Trust,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Can Government Policies Influence Generalized Trust?" In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arc Hooghe and Dietlind Stolle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71-190.

Walker, Edward T. 2008. "Contingent Pathways from Joiner to Activis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n Civic Engagement." *Sociological Forum*, vol.23(1): 116-143.

Warren, Mark. 2001. *Democracy and Associ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ichard. 2006.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Partial Proportional Odds Models for Ordinal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Stata Journal*, vol.6(1): 58-82.

Wollebak, Dag and Per Selle. 2002. "Doe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to Social Capital? The Impact of Intensity, Scope, and Typ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31: 32-61.

Yamagishi, Toshio and Midori Yamagishi. 1994.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18(2): 129-166.

Yesalis Charles E., Kopstein Andrea N., and Bahrke Michael S. 2001. "Difficulties in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Drug Use among Athletes." In *Doping in Elite Sport: The Politics of Drugs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Wilson Wayne and Edward Derse (Eds.). Chan paign, IL: Human Kinetics: 43-62.

Zak, Paul J. and Stephen Knack. 2001.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1: 295-321.

Zucker, Lynne G. 1986,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8: 53-111.

附录 A: 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信任 (从低到高4类)	1 522	2.44	0.792	1	4
社会信任(二分:高=1)	1 522	0.49	0.500	0	1
体育组织	1 532	1.66	1.252	1	5
宗教组织	1 529	2.66	1.583	1	5
政治组织	1 532	1.23	0.623	1	5
市民组织	1 531	1.97	1.207	1	5
文化组织	1 529	1.67	1.067	1	5
年龄	1 514	49.41	17.082	19	89
女性 (=1)	1 536	0.58	0.493	0	1
城市 (=1)	1 536	0.81	0.394	0	1
离婚 (=1)	1 534	0.17	0.374	0	1
教育 (年数)	1 529	13.74	2.971	2	20
家庭收入(×1,000 \$)	1 406	59.66	42.727	0.5	150
政治观点	1 505	3.68	2.051	1	7
新教信仰 (=1)	1 534	0.15	0.360	0	1
黑人 (=1)	1 533	0.11	0.312	0	1
工作 (=1)	1 535	0.60	0.489	0	1
职业声望	1 536	45.44	18.232	0	90
家里有小孩(是=1)	1 536	0.36	0.481	0	1
与朋友一起愉快	1 535	4.37	0.980	1	5
孤独	1 523	2.41	0.981	1	4
参加类型	1 523	1.92	1.437	0	5
参加多个类型组织(是=1)	1 523	0.56	0.496	0	1
参加多个包容性组织(是=1)	1 530	0.28	0.448	0	1
参加多个排他性组织(是=1)	1 530	0.28	0.448	0	1

## Exclusiveness and Connectedness: The Effects of Social Involvement on Generalized Trust

LIU Chang-xi      CHEN Xin-x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associational involvement on the creation of generalized trust. Data from the 2007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s Leisure Time and Sport module were used to examin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involvement in five type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individuals' level of trust toward others. By differentiating associations as inclusive (without exclusive belief systems) vs. exclusive (with exclusive belief systems), results from both ordered logistic and logit regression analyses demonstrate that attending inclusive association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social trust and that more attendance leads to higher generalized trust. Furthermore, attending exclusive associations has no impact on social trust, and only the connectedness among inclusive associations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net effects on generalized trust.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are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generalized trust in society, we should provide a soci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inclusiv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Key words:** Exclusiveness; Connectedness; Social Involvement; Generalized Trust; Voluntary Associations.

(责任编辑:王玉君)